

文学研究丛书

张珂◎著

民国时期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 (1912—1949)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由人文在线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民国时期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

(1912—1949)

张珂◎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1912—1949 / 张珂

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117-3326-9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批评史 ②文学批评史—美国 ③外国文学—文学批评史—中国—1912—1949

IV. ①I561.06 ②I712.06 ③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745 号

民国时期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1912—1949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曲建文

执行编辑：程 彤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186 千字

印 张：14.5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目 录

上 编 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史”的书写

引 言	3
第一章 晚清至民国：“英国文学史”从无到有	6
第一节 晚清时期英国文学学科的酝酿：从同文馆到大学堂	7
第二节 民国三十年：英国文学学科的初步发展	9
第三节 “文学史书写高潮”中的“英国文学史”	14
第二章 作为自觉著述的“英国文学史”书写	19
第一节 民国时期英国文学通史的书写	19
第二节 英国文学断代史、专题史的书写	44
第三节 民国期刊中的英国文学史书写	53
第三章 作为学术译著的“英国文学史”书写	59
第一节 英国文学通史翻译的“欧风美雨”	60
第二节 英国文学断代史、专题史的翻译	67
第三节 民国期刊中的英国文学史译介	75
本编小结	81

下 编 民国时期美国文学的评介与研究

引 言	87
第四章 历史回溯：晚清中国人对美国文学认识的发生	94
第一节 晚清中国人对美国的初步认识	94
第二节 晚清中国人眼中的美国文学	100
第三节 林纾的美国文学评论及价值	107
第五章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美国文学的总体评介与研究	113
第一节 20 世纪 20 年代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学的总体评介	114
第二节 20 世纪 30 年代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学的总体评介	126
第三节 民国学界对美国女文学家与黑人文学的关注	142
第六章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美国文学各文类的评介与研究	153
第一节 民国学界对美国诗歌的评介与研究	154
第二节 民国学界对美国小说的评介与研究	168
第三节 民国学界对美国戏剧的关注	176
第七章 20 世纪 40 年代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学的评介与研究	181
第一节 马耳、孙晋三对美国小说的评介	182
第二节 徐迟、杨周翰对美国诗歌的研究	188
第三节 对美国文学的其他综合评介	196
本编小结	200
附录一 民国时期我国的“英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203
附录二 民国时期美国文学评介与研究主要文章目录	213
主要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224

上 编

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史”的书写

引 言

21 世纪以来,对 20 世纪学术史的书写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伴随着西方学术方法的引进和中国传统学术的解体,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民国时期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期,也是我国现代意义上学术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作为现代学术的标志,学术科学化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潮流。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和文学观念的近代转型,“文学史”作为一种科学而独立的现代学术书写形态,开始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中国作为一个史学传统高度发达的国家,整个 20 世纪在文学史书写这一领域的成果可谓蔚为大观。民国时期无疑是这股文学史书写高潮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无论是具体的国别文学史,如中国文学史、各语种国别文学史,还是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乃至各种专题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等,这一时期皆大量涌现。“英国文学史”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既有国人的书写尝试,也有作为特殊书写形态的学术译著;既包括了通史,也有断代史和专题史。其他尚有具备文学史性质的史论、史评等。这些英国文学史著译有的是作为启蒙大众的普通读物出现,有的参与了民国大学英语文系的教育实践,有的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研究意义。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史”存在的格局,显示了早期中国学者利用“文学史”这种模式在学术上做出的建构,也是他们文学观、文学史观的反映。作为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一页,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在 20 世纪有着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极其值得重视和总结。近年来,学界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史的总结取得了多项重

要的进展，这其中既有对综合性的外国文学研究史的考察，也有对各国别文学研究史的梳理。前者如申丹、王邦维主编，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6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何辉斌、蔡海燕《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史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等，后者如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4卷本）（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不乏对英国文学史研究的总结，如龚翰熊的《西方文学研究》重点对曾虚白和金东雷的两部英国文学史做出了点评。国内学界将中国学者的“英国文学史”书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加以考察的第一本专著是段汉武的《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版），该书对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著述做了总体的回顾与梳理，重点研究了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时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分期、叙述模式等问题，也简要回顾了民国时期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情况。但由于问题意识的导向不同，这两本书并未对民国时期的英国文学史进行全面详细的清理。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外国文学研究在本质上具有比较文学性质，因为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本国的眼光和知识背景去审视外国文学。而研究外国文学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文学与学术的发展。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别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书写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教授在编纂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时，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外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文学史骨架如何建立，叙述如何结合评论，以及建立怎样一种文学史模式等问题上。他试图打破传统的苏联模式和英美模式，建立起中国的文学史模式。新世纪以来，蒋虹、刘文荣、区钭等学者也曾在期刊上撰文，讨论英国文学史的中外版本对比、英国文学史教材书写的学术理念、英国文学史书写的中国模式等问题。相关论文包括但不限于：蒋虹《“英国文学简史”国外版本的比较研究》（《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中外英国文学简史版本对比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区钭《关于英国文学史编撰的思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张建平、梁松林《论英国文学史教材撰写中的学术理念》（《南昌高专学报》2006年第5期）；刘文荣《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

模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世红《新时期英国文学史研究中前辈学者的贡献》(《国外文学》2012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具有多年的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经验,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英国文学史书写问题。

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英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虽有所涉及,但对民国时期丰富的英国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关注仍相对较少,鲜见专题式的深入总结和梳理,缺乏对这些历史资源当代价值的阐释。可见,该问题至今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这无疑不利于学术的历史传承和超越创新。对学术史的关照是任何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民国时期作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初步兴起和繁荣阶段,在学术史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学界虽有较多人关心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学术史构建,而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缺乏了解和整理,将导致不能纵向地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影响学术判断的准确性。^①

基于此,笔者试图对民国时期的英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进行专门的考证与梳理,并试图回答以下一些基本的问题: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史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出现过哪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学者?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存在状况?这些文学史各自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又有哪些共同的因素?在外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它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文学史的书写对于今天有哪些有益的影响和启示?它们的缺陷和不足在哪里?本编尝试首先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① 蒋寅:《学术史:对学科发展的反思和总结》,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4期。

第一章 晚清至民国： “英国文学史”从无到有

英国文学史作为英国文学学科知识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者，它在中国的出现，与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密切相关。“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整个社会走向近现代化的产物。它萌生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朝末年，而在民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①“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要说‘西化’，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讲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②从大学教育的角度切入历史观察，我们发现“英国文学史”首先作为一门课程在这种门庭转换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课程讲授和参考的需要推动了教本或讲义的书写，继而又刺激了专著的产生。这其中的变迁转换过程绝不简单，而是受到时代因素、历史机遇等各方面的综合作用。总的来说，正是在“一环扣一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将“英国文学史”的讲授和书写体制化、经典化。因此，谈论英国文学史书写在中国的出现，必然关注中国大学教育中“英国文学学科”的起源。

①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第一节 晚清时期英国文学学科的酝酿： 从同文馆到大学堂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开明人士意识到“语言不通，文字难辨”对于外交造成的巨大障碍，提出设置专门的学校培养通晓各国语言的人才，以解决办洋务和培养“译员”的当务之急。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清朝开办现代学校的第一次尝试，是其开始注意学习外部世界的必然之举。同文馆初办之时，因教习缺乏，只开设了英文一个馆，学生只有十人，都是八旗子弟。课程只有英文、汉文两科。英国传教士任英文教习。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官方英语教育的开始。京师同文馆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清政府服务的外交外事人才，并非面向普通大众的英语教育。但自此以后各地相继开办了许多类似的洋务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英语都成为这些学堂最先设置和最受重视的课程。京师同文馆等洋务学堂的兴办，为日后京师大学堂等一批高等学府的创办，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清朝末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与中国现代学科规范的建立与学术发展关系极大。”^①从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缘起，我们可以找到我国英国文学学科建立的最初印记。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课程。学生凡在三十岁以下者，必须认习一门外语。这是京师大学堂历史上的第一份章程，专门标举二义：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②显然，大学堂的创建者一开始是将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文学习作为“西学”的入门路径看待的，并非开办学堂的全部目的。“中西并用”的指导方针远不及“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来得响亮，彰显了突出“中学”的意图。

1902年由清大臣张百熙拟定，后经清政府批准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② 汤志均、陈祖恩：《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是京师大学堂历史上的第二份章程。该章程规定分科大学共设七科三十五目。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学院，目相当于后来的系。这是我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开始。外国语言文字学在文学科占据了一席之地。设有英、德、法、日、俄五种语言，教法要求包括文法、翻译和作文。^① 1903年，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延续了前一章程的分科模式。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两相对比，我们发现第二个章程中的“外国语言文字学”细化为英、法等五国的“文学门”。但后五者近乎“摆设”，长时间内都“虚位以待”。因为包括英国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在晚清人眼中是不属于“西学”的，“西学”更多地是指声光化电等近代科学技术。而且晚清新教育的提倡者，就是为了改变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虚文”而“轻实学”的传统，认为“溺志词章”是旧式教育的通病。即便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词章学），一开始也没有成为大学堂课程设置的重心。^②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需要外国语言文字承载的外国文学教学想要落实何其难！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三份章程毕竟突出了外国文学应有的地位。而这也确乎是包括英国文学门等在内的各国文学门在官方的办学章程里第一次出现。《奏定大学堂章程》还规定修“中国文学门”者除了主课之外，也要修包括“西国文学史”“西国语文”在内的补助课。现今大学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即与这个观念有关。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学门的补助课已明确包括“英国近代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课程。至此，我国英国文学学科的建立已指日可待。

从《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到《奏定大学堂章程》，这三份章程，虽延续了自同文馆以来重视外语教育的理念，但包括英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学科依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独立的地位。尽管如此，这三份章程对各外国文学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一纸虚文，它们在章程中的出现和细化，毕竟也透露了其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潜在条件。晚清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酝酿，成为民国时期各大学英国文学学科建立的先声。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②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参见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5、111页。

第二节 民国三十年：英国文学学科的初步发展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撤销了原清政府的学部，设立教育部。从1912年到1913年，教育部颁布和确立了民国学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规定了高小有条件的可开设外国语，中学课程以英语为主，遇地方特别情况的可选取其他语种。外语周课时为6~9个，甚至超过了国文课。专门学校中设外国语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英语教育已经被从上到下普遍推行，进入了专业化程度。这些专门的外国语学校除了个别俄文专修馆外，都将英语教育作为最基础的语种教育之一。虽然这一时期的外国语学校以培养历史转折时期的外语人才为目标，以语言能力的训练为重心，但在这些学校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从单纯的语言学习上升到文学研究的痕迹。如1913年成立的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英文本科课程已经有“英国文学史”一门。后来这些专门的外语学校都相继停办或并入各类大学的外文系，但其课程设置却基本得到了延续。大学是民国时期英语教育、英语文学教育的重镇。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国内就业方面外语人才也格外吃香。社会现实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使得外语教育迅速发展。“从1912年至1949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由于整个社会是半殖民地性质，教育得不到重视。但是正由于这种社会性质，外语（尤其是英语）教学却得到畸形发展的机会。”^①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中尤为突出。民国时期的大学分国立、私立两大类。私立大学中又包含一定数量的教会大学。各种大学的英语教育情况不尽相同，我们选取各类学校中的代表加以分析，试图描绘出英语教育、英国文学学科的成长轨迹。进入我们视野的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等高校。

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然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但它在早期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却举足轻重。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具代表性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办的，创设于1879年。教会大学的性质使得它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英语教育。尤其是卜舛济任校长后，大力推行英语教学，逐步将英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语变成教学语言。圣约翰的英语教学成了它最为人称道的特色，社会上有“圣约翰英语”之称。在英国文学教学领域，圣约翰也走在时代前面。圣约翰在五四前期（1917—1919）的课程体系中，文学部的文学科，就开设有英文文学史、19世纪之文学、英文小说、英文诗歌、莎士比亚剧本、以利沙伯时代之剧本、弥尔顿诗集、近代英文散文等课程。^①圣约翰还规定了各门课程的特点、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这种详细程度与昔日京师大学堂对各国文学门的草草带过形成鲜明对比。如英文文学史，“旨在将文学各部依类汇集，使学生于文学一道更形晓畅而爱玩不释，以鼓励其益好自修文学之心”。“教员演讲文学变迁之要点，及文学大家生平及其著作。学者须留心自行研究，并各自专读一家，著为论说。”后又将此条改为“留心自行研究，旁证博采”^②，更为强调知识的广博性和思想的多维性。到30年代，圣约翰的课程体系中，英文学的课程门类数已多达十几门，在各种文科课程中是数量最多的。“英国文学史”也成为必不可少的课程之一。^③圣约翰培养的英国文学人才，有的成为我国早期英国文学史的主要书写者或编校者。如曾虚白，林语堂等，皆是圣约翰出身。^④他们在这里打下的坚实的外语基础和受到的英国文学熏陶，为他们以后进行英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在国立大学中，以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为例。前文已详细讨论过京师大学堂历史上的三份办学章程对英语教育及英国文学的暧昧态度。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时代大潮还是如期而至。辛亥革命后，严复任北大校长，在学校大力推广英语会话。后人评价此举，认为对英语教育有所促进，但也形成了一种盲目崇外的风气。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英语教育在大学校园内的风靡。1914年胡仁源任北大校长后，对课程规模进行了调整。文科除中国文学外，增加中国哲学和英国文学两门。学校还成立了教科书编委会，英语由严恩樞主编。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北京大学文科一览》（1918）等资料记载，此时英国文学门已有扬子余开设“英散文”，胡适和辜鸿铭开设“英

① 熊月之等：《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32页。

② 熊月之等：《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42页。

③ 《圣约翰大学一览》，转引自《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152页。

④ 据《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见熊月之等：《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8—459页），“林语堂”1916年获文学士学位，“曾熙伯”1918年获文学士学位。

诗”，另有外教传授预科英文、本科作文及英文学等。1919年北京大学改门为系，英文系是十四个系中的一个。教学行政组织机构中也设有英国文学教授会。根据1924—1925年英文系的课程安排，各种类型的英国文学史课程已经成了必修科目。主要课程有：英国文学史略、伊丽莎白时代文学、17—18世纪英国文学、浪漫派文学、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英国现代文学等。授课教师包括张歆海、徐志摩、陈源等人。30年代初蒋梦麟在北大主持校政后，设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包括英、法、德、日四组）被统一划在文学院名下。此间英文系的课程设置较之20年代又有所增添，但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课程却始终存在，而且都是必修科目。如1929年至1930年、1931年至1932年两个年度开设的必修课程包括：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中古代文学、19世纪文学、复兴时代文学、18世纪文学、近代文学等。除了必修课之外，尚有小说史、戏剧史、近代诗以及专门的作家研究等各种选修课。课程的讲授者包括王文显、温源宁、陈受颐以及外籍教师温德（Winter）、翟孟生（Jamson）等人。北京大学的英语教育及英文系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最初京师大学堂章程里的“一纸虚文”终于有了坚实的实践支撑。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别受重视的中央大学，也在文学院内开设了外国文学系，并提出要“研究各国文学及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①。不同于北京大学的是，中央大学的外国文学系课程设置中，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源流之类的文学通史课程为必修课。而断代文学史课程，如17世纪英国文学、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英国文学等则为选修课。至于1937—1946年强强联手的西南联大，外文系课程更是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包括英国文学史在内的国别文学史、各种断代文学史（如18世纪英国文学、现代英国文学等）、专题文学史（如英国诗史、现代小说等）等都以选修课出现，且十分丰富。任教者更是专家林立，如叶公超、柳无忌、李赋宁、钱钟书等。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学习的知识相当全面和系统，这些课程也代表了民国时期大学外文系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培养宗旨。

在私立大学中，国人创办的南开大学自成立起就重视英语教学，“英文被列为主要的课程之一，不仅课时最多，而且自修时间，英文一门，殆占时之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七八”^①。南开大学模仿美国大学经验，除国文外，全用英文讲授。学生常“为西文书籍所困，而不能读中国书”^②。南开大学的英文学系设于30年代，挂于文学院名下。1931年原保定河北大学英文系撤销，学生保送南开大学。英文系成为人数最多、最为活跃的系。据说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华路过天津，讲授萧伯纳专题的黄佐临还带学生去天津车站欢迎。南开大学师生还成立“人生与文学社”，并编辑相关刊物。英文系的主要课程涉及文学史的有西洋文学入门、英国小说史、爱尔兰文学等。虽然与北大等校相比，南开大学是个小学校，但南开大学的英文教师队伍中有留美经历者过半。以后翻译《英国文学史》，且写过多篇英国文学史论文字的柳无忌，此时就在南开大学任教。柳无忌当时在天津还主编《益世报副刊》，借此机会发表了不少师生研究英国文学的作品，进一步激发了南开师生研究英国文学的热情。

通过以上各类代表大学的英国文学教学和课程设置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学史”已成为民国时期大学英文系必不可少的课程，英国文学学科得到了初步的建设和发展。所以，40年代末，柳无忌在一篇文章里说：

从前，在教会大学内，英文或其他外国文获得极大的注意，但是主要的仅是应用西洋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不是对于西洋文学有任何兴趣。自从国立大学的西洋文学系成立以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西洋文学的研究已受到了国家的鼓励与保障，不只是投合一般读者的嗜好，或借助于以写作维持生活的作家。换句话说，这种外国语文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学问，与本国语文的研讨占着同样的地位。此类学系的设置与发展，表示着国家与学者都已公认了这点。盛极一时的西洋文学又在学院内种下了深根与固蒂。约从五四运动时起，大学已成为文化中心，而现在外国文学亦已受到大学学者的熏陶而培植起来了。于是，西洋文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③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包括英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

学科的发展必然以学术著作作为核心载体。随着“英国文学史”课程的开

①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②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③ 柳无忌：《西洋文学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4页。